

阅读是人类的生存之道

□ 于殿利



可以说，阅读从来没有像时下这样受到过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因为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文化发展滞后、道德诚信滑坡、理想信念缺失等现象；另一方面，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国人的阅读量明显偏低。阅读受到普遍关注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各领域、各渠道、各媒体反馈出的阅读之声渐盛，各种阅读推广、阅读节目、阅读奖项、好书推荐、好书评选活动可谓百花齐放，选出了很多货真价实的好书，传播了很多有意义的理念，这是令包括出版人在内的关心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人们由衷欣喜的一种态势，意味着国家与社会近些年来孜孜不倦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已见成效。关于阅读本身，也开始了热议，并尝试从学理上进行阐释，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知名青少年阅读推广人朱永新先生的最知名的观点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但同时有的提法也值得商榷，例如“阅读是私事”等，尽管从某种角度说，它也不无道理，因为毕竟个人是阅读的主体，个人有选择读与不读，读什么、读什么时间读，在哪里读的自由，更何况还有“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之类的阅读效果差异，以致于看起来阅读的确是私人的事。但是，深究起来，这种看法便似是而非了。从我自身作为人文社科学人、出版人和文化企业管理者的亲身体会，我认为这种说法至少是有失偏颇和不甚全面的。我认为，阅读不只是“小隐私”，而应是“大概念”。阅读和出版一样不应止于自由消遣，而应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一种关系到人类繁衍生息和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责任。

量整合起来，做单个人干不了的事情；二是把单个人的弱点甚至缺陷屏蔽，甚至化为无。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国家以它至高无上的意志、伦理精神把整个民族凝聚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国家先于并高于家庭、市民社会，是它们存在的前提，是决定的力量，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形式。它是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个人只是国家的一些环节，生活在国家中，才能获得个人的人格、自由和价值。”人是群体性、社会性或组织性动物，人的一切活动都具有群体性、社会性或组织性，读书或阅读自然也不例外。这是由图书和阅读的特点，以及读书或阅读已经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等因素决定的。图书这种产品的使用价值在于其内容，而内容的核心在于思想、观点和方法，而思想、观点和方法是由语言文字构成的，或者说说是通过语言文字得以表现或表达出来的。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果，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甚至是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和伟大发明的基础。语言文字本身就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它是顺应人与人之间交流之需而产生的，如果人与人之间不需要交流，语言文字断然没有出现的必要和可能，交流之需决定了语言成为人类的社交工具，以文字为主要内容的图书因此也就具有了社交性和社会性。像德国的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这样的语言和哲学大师甚至都认为，人本身就是一种对话，荷尔德林就有这样的诗句：“人已体验很多。自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能彼此倾听，众多天神得以命名。”海德格尔阐释说：“自从时间是它‘所是的时间’以来，我们就是一种对话。……两者——一种对话存在和在历史中存在——是同样古老的，是共属一体的，是一个东西。”因此，阅读也就不只是纯粹个人与世隔绝的私属活动，而是通过文字和图书与他人交流思想、分享知识的活动，书写的文本是一种在纸上的对话。古罗马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圣奥古斯丁认为，字母“之发明，使我们甚至得以和不在现场的人对话”。读书或阅读甚至超越一般的社交活动，可以超越时空与自己素不相识的古代先哲、现代名人以及异域作者展开心灵对话。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与人交流是有限的，而超越时空的心灵交流则是无限的，这是读书或阅读这种社交方式之超越性的另一重要体现。我们的社交交往，往往为我们出身的家庭、阶层、地域或国家所约束和局限，而借助阅读，我们可以挣脱这些与生俱来的屏障，自主地选择人类最高尚者、最聪慧者，以及最伟大的一批心灵来交往、结识，与他们共鸣并获得灵魂的提升和愉悦。从这一角度来说，阅读是人类最平等自由的一种社交方式。阅读又是一种成本最低的社交活动，只需少许投入即可遍访古代前贤，交流当今名士。16-17世纪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法国著名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在谈到自己在学校的学习体会时讲到：“遍读好书，有如走访著名的古代前贤，同他们促膝谈心，而且是一种精湛的交谈，古人向我们谈出的只是他们最精粹的思想。”他接着意味犹未尽地进一步指出：“同古人交谈有如旅行异域。”

读书或阅读是通过词语与宇宙万物进行对话，认识、了解万物，甚至与万物结下友谊。德国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在谈论语言的本质时说：“在我们思想的道路上，我们开始时所获悉的在词语上的诗意经验将伴随着我们。我们已经与这种诗意经验一起进入一种对话之中。”古罗马著名演说家、哲学家和政论家西塞罗有一句名言说：“词语是事物的符号。”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诗《词语》，反复被语言学家所引用、研究，其中被称为诗眼的名句“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更是阐明了词语不仅是语言，它代表着宇宙万物。因此，我们可以说，阅读词语就是在熟知万物，领略宇宙万物之妙之美。海德格尔对《词语》这首诗给出了这样的评论：“倘若没有如此这般的词语，那么物之整体。亦即‘世界’，便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包括‘我’，即那个把他所遇到的奇迹和梦想带到他的疆域边缘、带向名称之源泉的‘我’，也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哲学家还有更深的思考，即人们在认识宇宙万物之中，或者说通过宇宙万物，来发现自我。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在书中与宇宙万物结识，通过文字与古今中外的作者进行思想交流，这就是阅读的妙处。所以，读书或阅读这种社交活动不会给人以丝毫的孤独感，阿根廷裔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耳在谈到自己阅读的感受时说：“我不记得曾经感到孤独；事实上，在寥寥几次和其他小孩碰面的场合中，我发觉他们的游戏及谈话远不及我所读之书书中的冒险和对白有趣。”好书如同好朋友一样，不仅终生受益，而且难以割舍，阿尔维托·曼古埃耳同样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对自己在图书馆的偷书行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旦我念过了一本书，我就无法承受与它分离之苦。”现代社会出现了“宅男”、“宅女”一族，顾名思义，所谓的“宅男”和“宅女”一般都是长时间待在家里，甚至可以一个月不出门不下楼，但这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而是通过互联网畅游世界，与人交流、交往，或者读书、看电影，如果没有这些关在屋里就可以与世界交往的条件，任何人都不能独处很长时间，这是由人性之社会性特点决定的。

阅读是为了活着，为自己，更为社会

老一輩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在青年时期便发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呐喊，这句著名的呐喊不只是他个人理想的呼唤，还道出了读书或阅读的真谛，即为为什么要读书，或者读书是为了什么。读书或阅读不是不想读就不想读就不读的私人爱好，读书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培养竞争能力必须为之的事业，这是由宇宙环境、人性的特点和阅读的性质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命令式。这种生存和竞争能力不仅关乎自己的命运，更关乎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和国家的命运。

生存压力和竞争压力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因为上天虽然赋予人以“万物之灵”的高贵生活，却没有赋予人得享高贵生活的自然本领，相反，与其他动物相比，人是最没有自然本领的动物，人必须依靠后天的习得培养和练就本领，甚至必须依靠群居的生活方式，才能为自己赢得生存的机会，才能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在与动物对生存空间等的争夺中，在人类共同体内与其他民族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人是很弱小的，其面临的生存和竞争压力数不胜数，而来自所有方面的威胁，在人类历史上自古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几乎都要靠读书获取知识来破解。这就不难理解阿根廷裔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耳在其代表作之一的《阅读史》中，用一整页的篇幅，以“最后一页”的名义，只抄录了福楼拜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而且，“最后一页”却置于卷首的醒目位置，其警示意义不言而喻。

人类首先面临的是来自其他动物和自然灾害的威胁。18世纪中至19世纪初的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赫尔德在研究语言的起源时，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宇宙中的万物尤其是动物都至少有一种足以让其生存下来的能力，他把它称作本能，例如蜘蛛的织网能力、蜜蜂的筑巢能力、鸟的飞翔能力、鱼的潜水能力、各种野兽所独有的凶猛、力量、速度以及牙齿、爪子、眼睛、耳朵甚至鼻子和舌头等特殊能力等，唯独人在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平庸，“就本能的强大和可靠而言，人远远比不上动物”，“人赤裸裸地来到世上，他是一种缺乏本能的动物。就此看来，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人无法依靠在

各方面都显平庸的本能征服变化莫测的自然灾害和对付豺狼猛兽的侵犯。赫尔德接着分析道：“这种缺陷决不可能是人的种属特征，除非大自然对他就像最残酷无情的继母一样不公，要知道，自然对于每一种昆虫都是一位最最慈爱的母亲。她给予每一种昆虫它正好需要的东西。”“那么，根据自然的类推”，它就应该也赋予“人所独有的东西”，这种“人所独有的东西”“是人类种属的特征”，“它对于人就像本能对于动物那样重要”，“人所独有的东西”产生于大脑，就是思维和思想，作为哲学家的赫尔德称之为“理性”。“人的所谓理性，就是一切人类力量的总和形式，就是人的感性本质和认知本质、认知本质和意愿本质的结合形式，或更确切地说，是与某种机体组织相联系的唯一积极作用的思维力量。”人类就是凭借着思维或思想的独特力量，一方面利用记忆力、综合、分析和判断力熟悉动物的习性，掌握自然的规律，以规避自身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发明语言和生产工具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语言和工具又反过来促进思想或理性的不断提高。人类经验和知识的获得全靠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都远远不够，处处是凶险，认识无止境，人类必须把难得的经验、知识和技术代代相传，不断积累得愈益强大，人类的生存能力才愈益强大，这是人性的天职。对此，人类的先贤们早有领悟，例如赫尔德就曾指出：“如果每个人只为自己从事发明，无谓的重复劳动就会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进行发明的知性便被剥夺了最宝贵的特质，即生长。”以语言记录为核心的图书和读书就是人类最重要传播知识和传承技能的手段，因为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语言文字才能得到可靠、持久的传播和传承。阅读对于人而言，就像吸氧一样重要，吸氧维系的是人作为生物体的存在，读书或阅读则既是维系人作为生物体存在的需要，更是维系人作为社会生命体存在的需要。阿尔维托·曼古埃耳在谈到阅读的体会时写道：“我们每个人都阅读自身及周遭的世界，俾以稍得了解自身和处所。我们阅读以求了解或是开窍。我们不得不阅读。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

对付动物和自然灾害的同时，人还面临着来自人类内部竞争压力。19-20世纪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20世纪中叶发明了一种被称为“轴心期文明”的历史哲学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他反复强调，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一场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运动”，类似的思想几乎通篇贯穿在黑格尔19世纪早期的著名著作《世界哲学讲演录》（旧译《历史哲学》）中，例如书中就有“从整体上看，世界史中存在的是同一个进程”的论述。此后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发展脉络正在验证两位大师的思想，世界历史的这种“统一运动”正以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这种“全球化”趋势不再需要大师或专家学者们来阐述，就是乡野村夫也会洞察无遗，因为他们也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了。然而，让先哲们始料未及的是，“全球化”的“统一运动”并没有为人创造超出以往历史阶段更多的“和谐”，相反却加剧了各国、各民族利益竞争的激烈性，从低端的赤裸裸的资源争夺竞争，到隐蔽的军备、科技和信息情报竞争，最后演变成以各种借口作为遮羞布的战争，因为“全球化”意味着无遮拦、无阻碍、无边界，强者可以肆无忌惮地走遍天下，弱者只能任人宰割，真正的强者是智力强大者，思想强大者和文化强大者，科技、教育和文化乃国之根本，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注定要沦为智力、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侏儒，不会有任何竞争力，更不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引以为傲的贡献。作为公民来说，读书是为增强自身的力量，更是为国家培育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生产力，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性，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阅读都是终生的事业。

一个族群的人还面临着来自本社会的生存压力。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消耗社会资源和财富，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把努力一生的追求目标。如果一个正常人消耗的财富比创造的财富多的话，那么在这个社会中他就是“负数”；如果每个人消耗的财富都比创造的财富多的话，这个社会必将没有东西可以消耗，这个国家就将无法延续下去，这个民族就将无法繁衍下去。作为社会的人，其一生可以明显地划分三个阶段：学习、工作和退休。学习期就是成长期和积累本领的时期，从另一方面讲，也是纯粹的消耗期，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不创造任何价值；工作期就是回报期和创造价值的时期，虽然为了更好的回报和创造价值还要继续学习；退休期就是享受期，享受自己与他人共同创造的价值，也可以说是社会对曾经创造价值之人的回报期。在生命的三个阶段上，有两个阶段处于消耗期，而只有一个阶段是创造期，所以对个人的创造性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人若要具备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力量，就必须读书，必须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具有先进的思想，有理想有信心，

(下转第十版)

智库是热还是躁

□ 王 文

要让智库真正“热”起来，需要自上而下地给予智库更多的信任、荣耀、尊重和独立空间。

近些年，中国智库“热”引发不少舆论关注。然而，仔细阅读官方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概念确定与功能描述，就会发现中国智库非但没“热”，离国家真正所需要的“智库热”状况还相差甚远。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定义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即“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这里的关键词在于，“研究对象”、“服务主体”与“非营利性”。但是，目前社会上却有一些以“智库”之名出现的躁动性的“智库”变异体。

类似躁动主要可分为三类：躁动一：商业化。笔者不只一次看到某猎头公司、咨询机构在自我宣传时，都标榜自己是“著名智库”。这是对“智库”名称的盗用。商业咨询机构的研究对象五花八门，服务主体千奇百怪，且必须以营利为主要手段，这与智库“服务于党和政府”、“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非营利”等三个较为严格的明确的属性明显不符。这些商业公司以“智库”标榜，可能源于对“智库”的理解不足，也可能是“智库”这个词看上去高、大、上。对此，目前还无法用政策、法律的手段进行制止，但可以通过舆论的正本清源，最终达到社会对“智库”的集体共识。在美国社会，麦肯锡是咨询公司，兰德公司是智库，这个属性差异是相当清晰的。

躁动二：泛化。一些传统的学术机构担心自己已被政策所冷落，也纷纷进行智库转型，有的甚至是研究历史、考古和纯理论的学术机构。类似这样的泛化趋势，凸显了传统学术学者对现实关怀与研究转型的努力。然而，学术需要坐冷板凳，需要有更多基础性的奠基与材料储备。比如，丝绸之路的研究，涉及到各国历史研究、敦煌学、少数民族学、小语种研究，也涉及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政策走向跟踪、对中国影响的评估研究，前者的研究相对冷门，需要长期积累，与目前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相关性较远，不必赶时髦，但许多研究结论往往能够给予后者的研究以不可或缺的发启和铺垫，此时，“学术”与“智库”就应有分工。

躁动三：娱乐化。个别民间学者以“大师”自居，有的还装出高冷和深不可测的样子，对外半遮半掩地宣称与某某高层很熟，为其高攀云云；有的则以写畅销书、媒体曝光为主要目标，语不惊人死不休，常以“国家危机”、“美国阴谋”等关键词抓人眼球，也会自诩“智库”。两者的研究工作未必没有价值，但这两类研究工作，娱乐性较强，容易被视为“研究型艺人”。

目前，中国带有“研究”字样的机构至少有20万家，但真正被全球最权威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持的《全球智库报告》最新确定的中国智库，仅仅429家；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所确定的中国智库数量仅300多家。为什么中国智库的数量那么少呢？根据《意见》中就智库的八项基本标准来看，智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机构，而是具有特殊功用的研究机构。

第一，《意见》提到的第一、三、六、七条标准，智库应是“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具有一定影响的专家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目前许多研究机构，尤其是高校内研究机构不少都只是挂了一个牌，有的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甚至兼了七八个研究机构的“主任”或“所长”；有的高校，一个办公室挂着四五个研究机构的门牌；在高校内部，有不少知名教授，限于经费、机制配套不足的原因，常自嘲“学术个体户”，既没有研究助理，连填表申报、订机票、报账等琐碎行政工作也得亲力亲为。可见，“实体性”缺乏，是长期以来中国难能孕育更多优秀智库的重要学术原因。

第二，《意见》提到的第二、五条标准，智库应有“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有“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目前，大多数学者没有成果送报的路径，很难得到政府运行的一手数据和文本，也很少有机会进入政府部门体验决策运行的逻辑。此时，学者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难免会与政策现实差距较远，进一步造成官方冷落。而那些被官方信任的学者，往往被要求寡言少语、惜字如金，于是，“知道得越多，说得越少；说得越多，知道得越少”成为研究者的潜规则。研究与学术界存在的隔阂，是长期以来中国未能出现更多优秀智库的重要原因。

第三，《意见》提到的第四条标准，智库应有“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这条着实难坏了当下研究机构的诸多学者们。笔者走访过数十家欧美智库，均有专门的筹款人员，且数量不在少数。中国智库机构要靠行政拨款，研究缺乏独立性，要么紧缩拮据，报账结算均不易，“柴米油盐”严重抑制了中国研究者的智库积极性，进而致使大多数学者“避居三舍”，退到书斋里“闹革命”。缺钱，尤其是缺少可高效的长线，是长期以来中国未能涌现更多优秀智库的重要财政原因。

第四，《意见》提到的第八条标准，智库应有“开展国际交流的良好条件”。长期以来，“外事无小事”，出国审批、办国际会议审批、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审批，使中国学者在国际交流上往往谨小慎微。外事政策保守，是长期以来中国未能培育更多优秀智库的重要外事原因。

目前，《意见》虽然已出，但《意见》的具体内容仍然需要如《意见》最后一句话所说“结合实际，按照本意见精神制定具体办法”来落实。加速落实《意见》的重要杠杆，在于自上而下地给予智库更多的信任、荣耀、尊重和独立空间。正如欧美领导人喜欢到智库去做演讲那样捧举本智库，中国各级领导人不妨将各类重要演讲场合放在诸多中国智库的会议室。委托智库扮演更多“二轨”的角色，向社会推荐更多真正发挥作用的、受信任的智库学者，多到公开场合说话，久而久之，中国智库的“热”就会渐渐冒出来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王敏超